

“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

——《松花江上》的创作者和创作过程

□ 吴志非

1936年11月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全城到处可以听到《松花江上》歌声。后来，这首歌曲又迅速传遍全国。《松花江上》发表后，强烈地触动了中国人的亡国之痛，歌声所至，莫不唏嘘，成为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抗日歌曲之一。

鲜为人知的是，《松花江上》的诞生地是西安而不是东北，词曲作者张寒晖也不是东北人，他也不曾到过东北。

用歌曲唤醒民众

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在铁蹄下遭受凌辱、流离失所的东北人民的悲苦及心声。它的创作者就是与洗星海、聂耳并称“音乐三杰”的张寒晖，他一生创作了《军民大生产》《去当兵》等70多首抗战歌曲。

张寒晖的母亲去世早，父亲张振洲靠教书养活张寒晖弟兄5个，以及张寒晖年迈的祖父、祖母。家里终年糠菜半年粮，贫寒度日，实在养活不起众多的孩子，将张寒晖最小的五弟送人了。

在当时传统思想影响下，不愿断送张家的书香之脉，张寒晖的祖父和父亲还是东挪西借地凑足学费让7岁的他入私塾读书。幼时的张寒晖聪明但是非常淘气，11岁时到距家10里的翟城村高小读书。整日食不果腹的张寒晖，靠着坚强的毅力艰难求学。在学校期间，对歌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经常唱一些民谣和爱国歌曲。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读初中的张寒晖走上了街头，宣传抵抗日货，被学校开除。于是，他转到保定高等师范附中学习。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接受革命理论的陶冶。

1920年，曾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张寒晖直接去了北平，在北平私立电气工业学校学电工。

不久，张寒晖考入北平人艺戏剧专门学校。之所以报考这所学校，一是他从小喜爱戏剧，特别爱唱家乡独特的地方戏——定县秧歌；更主要的原因是人艺戏剧专门学校不但管学生的吃住，还发给一些零用钱。

1925年，张寒晖考入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同年加入共产党。在艺专，他在著名音乐家赵元任教授的指导下，对民族音乐、河北梆子、河北民歌及昆曲等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钻研，为后来的音乐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张寒晖带领同学参加“三一八”反对段祺瑞军阀政府的游行，跟随李大钊在游行队伍中一起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等口号。军阀政府疯狂搜捕爱国进步人士，李大钊惨遭绞杀，张寒晖也上了通缉的名单。张寒晖连夜剃光头，逃离北平，一路步行400多里回到家。



1936年的张寒晖

乡——在一天深夜，光着头、赤着脚出现在妻子的前面。

回到家乡的张寒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他帮助定县民教馆进行秧歌、民谣的搜集研究工作，并参加了由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会，编写农民通俗读物，参与创作了《农夫歌》《除草歌》《农家乐歌》《高头村歌》等歌曲，编印了《普村同歌集》。

1930年，张寒晖在北平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帮助组织剧社。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寒晖在中共河北省委的领导下，整组定县地下党组织，组织农民运动，成立抗日救国会，并以古老民歌《三国战将勇》的曲谱填写了《可恨的小日本》，以《满江红》的曲调填写了《告我青年》，号召青年“激奋进，齐赴国难”。

从此，他开始了用歌曲唤醒民众投身抗战的革命艺术生涯。

1933年2月，张寒晖接到他在北平国立艺专的同学好友刘尚达的信，邀他去西安工作。刘尚达时任陕西省教育厅社会教育科科长，兼任陕西省民教馆馆长。

此时，张寒晖在定县利用民众教育进行抗日宣传，已引起定县反动当局的注意。他接到信后动身去了西安。张寒晖到西安后，在陕西省民教馆任总务主任。然而，支持他们的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被南京政府撤免了职务，张寒晖和好友刘尚达被赶出了民教馆。张寒晖失业了，贫病交加。他两手空空拖着病体回家，冬天还没有棉裤，冻得瑟瑟发抖。

1936年夏天，张寒晖二次只身去西安，以西省立第二中学教师的身份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此次离家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西北参加革命活动，再也没能返回家乡。

饱含血与泪的旋律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1935年，10余万东北军被调至陕甘两地，拖家带口，愁容相对，乡音一起，一夜征人尽望乡。那是个什么样的家乡

呢？那是一片遭受侵袭的故土。广大东北军将士渴盼早日打回东北，赶走日寇，重返故乡。

古城西安街头，拥塞着成千上万愤怒的东北军官兵和无家可归的东北难民。张寒晖到达西安后，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一天夜晚，在东北军做地下工作的孙志远来看望张寒晖。孙志远给张寒晖讲了很多东北军对故乡的思恋之情和西安东北难民对丧失国土的悲愤之情，还送给张寒晖一本东北军第67军出版的《东望》杂志。封面上印着该军军长王以哲的亲笔题字：“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安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妹于水火之中。”孙志远望着沉思的张寒晖说：“寒晖，你多才多艺，写一首反映东北军思想感情的歌吧！”张寒晖早有些想法，经孙志远一说，更燃起了他为东北军写歌的欲望。

于是，张寒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一面宣传抗日方针，一面倾听东北同胞控诉日本鬼子的罪行，倾听他们对故乡、亲人的思恋，深刻体会到埋藏在他们心底的恨和痛。张寒晖日思夜想，心潮难平，眼前那片黑土地、那条松花江，仿佛在向他招手；东北依稀成了他的家乡。

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国仇家恨在张寒晖的胸中翻腾；东北难民的哭泣在他脑海萦绕；东北军和难民决心打回老家去的呼唤在他心灵震荡……“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歌词写出来了，内容和感情脉络分为怀故、漂流、呼唤3个基本层次。歌词的开头部分，诉说了家乡的美丽富饶，而九一八事变突起，日军占领了美丽而富饶的东北，人们只得背井离乡，在关内流浪。歌词的第二层次概括地描述了悲惨遭遇，透过诉说丧家的哀痛、逃亡的仓皇，控诉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歌词的第三层次用饱含无限感慨的发问，向故乡和亲人发出深情的呼唤，寄托了对早日收复失地的强烈期待，把感情推向了最高潮。

用什么音乐素材呢？张寒晖想起了家乡那独特的地方戏——定县秧歌中凄凄惨惨的“大悲调”，还有慷慨激昂的河北梆子；尤使他历历在目、萦绕耳边的是家乡女人哭坟时失去亲人的悲痛欲绝声——张寒晖在东北搬进定县的东北军53军的一个营中教歌时，士兵们的歌声是那样悲愤幽怨；在从军营回来的路上，他见一妇女在新坟上烧纸，哭号失去的亲人，那哭声拖着长腔，凄惨、辛酸、悲绝……张寒晖久久回忆着女人哭坟时的凄惨哭声，脑海里萦绕着东北军和东北难

民那悲愤幽怨声……

音乐素材有了，张寒晖于1936年11月奋笔疾书，一口气创作出悲壮动人的歌曲《松花江上》。

此歌既出，张寒晖先在西安二中学生中教唱，旋即引起强烈反响，教室外聚集起层层听众。歌曲唱出了那深重的民族创痛，感人肺腑。张寒晖的友人姚一征曾说：“当歌曲写完后，我们唱到‘爹娘啊，爹娘啊’时，竟呜咽地哭了。”

当时，正值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西安二中的同学们在游行队伍中唱起了这首歌，立即震动了西安古城。随后，由东北军政治部宣传队印成卡片分发到各军各师，又经中共地下党转给北平学联歌咏队。

同时，张寒晖把自己的这首歌教给群众演唱，并带领群众到西安的城墙上、街头中去演唱，悲怨壮烈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竟有数万名官兵听后落泪。

继而，这首震撼人心的歌不胫而走，迅速在东北军及东北难民中传唱开来，唱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

“流亡三部曲”之一

西安事变后几天，张寒晖按党的指示参加了东北军，任政治部人事股长兼“抗日演剧团”团长。身为东北军的一员，张寒晖唱着自己创作的歌曲，同样泪流满面。

1936年底，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指挥着东北军军官高唱《松花江上》。悲愤的歌声激起大家思念故乡的情绪。当歌声进入“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时，全场军官有的热泪盈眶，有的低头哭泣，有的举起了拳头。“一定要打回家乡去！”的决心，充盈着歌唱者的胸膛。

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时，谈及《松花江上》，激动地说：“（九一八事变后）成千成万的青年人无家可归，无学可求，尤其是东北的青年朋友，一再也飘泊流浪，一再也尝受人世间的惨痛。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伤心的人断肠”。对于抗日歌曲的巨大影响力，毛泽东也高度评价称“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

（摘自2024年1月18日《人民政协报》）



位于河南省永城市李寨镇麻家集村的抗大第四分校旧址

边教学边战斗的『马背学校』

□ 钱锋 周家俊



1938年10月初，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雪枫，率部队从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出发东进，开创豫皖苏抗日根据地。10月下旬，游击支队进入河南睢县、杞县、太康等地，积极打击日伪顽匪，扩大了新四军在豫东地区的影响力。随着部队不断扩大，游击支队迫切需要大批军政干部，彭雪枫等支队领导决定开办随营学校。11月，新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在河南省杞县傅集镇成立，彭雪枫兼任校长。1940年3月，经党中央批准，随营学校扩建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以下简称“抗大第四分校”），彭雪枫继续兼任校长。面对严峻的抗战形势，抗大第四分校克服无固定校址、专职教员匮乏、教学环境恶劣等困难，坚持边战斗边办学、边生产边办学，实现“放下枪就上课，拿起枪就打仗”，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马背学校”。

指挥员也是教员。抗大第四分校创办之初，专职教员十分匮乏，支队和边区党委负责同志都亲自到学校讲课或作报告。作为司令员兼校长，彭雪枫带头授课。他善用通俗语言，把一些枯燥生涩的内容讲得有滋有味，深受学员喜爱，是学校的“金牌教员”。在讲解游击战术时，彭雪枫概括为“暴风雨式的突然袭击”“集中一点打破一点”“东边打雷西边下雨”“牵牛打圈子”“化整为零”“超越近敌，袭击远敌”，使得深奥、抽象的战术原则顿时变得生动形象。他还先后为学校编写《游击战术的实际运用》《战略战术讲授提纲》等教材，结合理论与实践，系统阐述平原游击战思想。

1940年6月1日，新四军第6支队在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镇召开纪念“五卅运动”大会，检阅部队和抗大第四分校的训练成绩，号召边区军民继承“五卅”革命精神，争取抗战早日胜利。大会正在进行时，突遭日伪军千余人袭击。彭雪枫沉着果断地指挥部队和学员顽强反击，歼敌200余人，学员陆续安全转移。这是抗大第四分校成立后经受的第一次战斗考验，指挥员在实战中现场教学，学员在实战中提升战斗力。

时刻处于战备状态。抗大第四分校最初的校址，距离日伪据点只有二三十里。为适应战斗环境，抗大第四分校提出“加强军事生活，加强战斗准备”的口号，要求每名干部和学员枪不离身，全校武装起来，加强战斗训练和演习。经过训练，一个大队（营）在夜间紧急集合仅需8分钟。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面对日伪军“扫荡”和国民党军进攻，彭雪枫指示抗大第四分校采取小型、分散、隐蔽的办学方法，昼伏夜行，多次转移，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教学。3月中旬，彭雪枫调整教学组织，将学校干部、学员和后勤人员整编为3个工作团。彭雪枫还规定了各工作团的主要任务：协助地方政府筹粮、扩军、做群众工作，支援部队作战、同敌军进行游击周旋，以保存有生力量，执行巩固后方任务。

5月1日晚，抗大第四分校向淮上地区转移，准备东进办学。第一工作团经过50余里的急行军，突破宿蒙公路日伪军封锁线，转移到蒙城东北苗庄西南一带。3日晨，第一工作团在苗庄被国民党军两个骑兵团发现，这两个骑兵团随即对我军发起攻击，形势十分危急。担负阻击任务的学员在敌众我寡、武器陈旧的情况下，以屋顶、树干和墙体作为依托，用步枪、手枪和手榴弹与敌军展开巷战、肉搏战，顽强抗击敌人，虽伤亡惨重，但最终胜利完成阻击任务。“一面学习，一面战斗”的光荣传统由此继续发扬光大。

办学防务两不误。1942年11月，日伪军集中兵力对我军淮北腹地进行“扫荡”，抗大第四分校向洪泽湖东转移，在江苏省淮宝县（今江苏省三河入江水道以北，淮安

区、淮阴区以南，洪泽湖以东，宝应县以西广大地区）朱坝以南，盱眙县永丰镇一带，以学员队为单位，分批开展教学活动。国民党军利用日军“扫荡”之机，占领淮北抗日根据地山子头腹地。原担任淮宝防务的新四军第2师第5旅调往湖西参加战斗，抗大第四分校在肩负教学任务的同时，还要承担军事防务工作。

彭雪枫总结前后期斗争经验教训，专门指示：此次到淮宝单独行动，要建立起自己的侦察情报网，积极与各地建立有线电话联系，并制订各种应急措施。在彭雪枫指示下，学校很快与淮宝县独立团取得联系，共同建立起淮阴、淮安地域侦察情报网，互通情报，及时准确掌握敌情，把握主动权。

1943年10月间，日伪军实行“治安肃正”计划，在淮北、淮宝部分地区增设据点、修筑公路，企图向南蚕食我军边区。抗大第四分校部分学员在淮宝县委书记兼副校长陈锐鑫指挥下，在岔河以北主动出击，钳制和袭扰敌人，既粉碎了日伪军“治安肃正”计划，又掩护和保证了学校其他各队的正常教学秩序。参战学员在反“扫荡”战斗中将所学军事知识实践运用，逐步磨炼成长为部队战斗骨干。

1944年9月11日，彭雪枫在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不幸牺牲。为纪念彭雪枫，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政治部决定将抗大第四分校更名为雪枫军政大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抗大第四分校完成历史使命，于1946年改编为华东军事政治大学。

抗大第四分校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在解放战争中成长，是新四军中立成最早、历时最长的一所分校。其间，它吸收华中和江南的革命知识青年，培养出近5000名军政干部，为新四军第4师和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发挥重要作用。校长彭雪枫，为学校的发展壮大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摘自2022年8月25日《中国国防报》）

他的名字曾绝密二十八年

□ 喻思南

在1988年被媒体报道以前，很少有人知道于敏是谁，更少有人了解他在做什么，连他的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于敏从事的“高级的秘密工作”是研究氢弹和核武器。

于敏的科研生涯始于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钻研多年后，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将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交给了他。从那时起，于敏转向研究氢弹原理，开始了隐性埋名的28年。

当时的核大国对氢弹研究绝对保密，造氢弹，我国完全从一张白纸起步。由于大型计算机当时非常紧张，为了加快研究，于敏和团队几乎时刻沉浸在堆积如山的数据计算中。1965

年9月，上海的“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于敏以超乎寻常的直觉，从大量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数据中理出头绪，抽丝剥茧，带领团队形成了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然而，设计方案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在那里，科研人员吃的是夹沙子的馒头，喝的是苦咸水，茫茫戈壁风沙走石，大风如刀削一般，冬天气温低至零下30摄氏度，道路冻得像握板。于敏的高原反应非常强烈，食无味、觉无眠，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路，有时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解决完问题才离开基地。

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

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1969年，于敏带领团队来到了四川绵阳的深山里研究核武器。他判断，“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

他不敢停止脚步。但长期在艰苦环境里工作，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曾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于敏上台阶都要用手扶着腿才能慢慢上去，同事都劝他休息，他坚持要到小山冈上观测火球。由于操劳过度，在工作现场，他几近休克。1971年10月的一天深夜，于敏再次因为过度劳累休克……

2015年1月，89岁的于敏荣获

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满脸谦逊祥和。上一次像这般“抛头露面”，还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对于敏而言，他并不习惯这样的场合，在隐性埋名的那些年里，默默耕耘的他“沉”在深处很自在。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摘自2021年1月6日《人民日报》）

